

《列子》考论*

葛 刚 岩**

— <目 次> —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I. 序 论 | IV. 如何解读《列子》中的掺杂内容 |
| II. 由文献记载看列子其人 | V. 《列子》整理补缀的时间推测 |
| III. 列子与《列子》其书的关系 | |

I. 序 论

《列子》一书，历代学人颇为关注，纷纷陈述己见，发表高论。但时至今日，仍有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探讨。比如，该书内容如何形成？什么时间形成？书中内容何以驳杂无序？这一系列问题，前人虽时有谈及，但多是简略言之，少有详论。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。

II. 由文献记载看列子其人

关于列子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道家类释曰：“名圜寇，先庄子，庄子称之。”记载太过简略，很难说明问题。有关列御寇的故事传说，《庄子》中倒是多有记载，前后有七处之多，分见于《逍遥游》“故夫知效一官”章、《应帝王》“郑有神巫曰季咸”章、《至乐》“列子行食于道从”章、《达生》“子

* 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，得到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”资助。

** 岭南大学校 中国言语文化学部 专任讲师，武汉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

列子问关尹曰”章、《田子方》“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”章、《让王》“子列子穷”章、《列御寇》“列御寇之齐”章。但由于《庄子》所记多为寓言，因此其中记载的列子言行也被看作不实之录，难以取信于人，“所谓御寇之说，独见于寓言耳”。

基于上述情况，历代研究者对于列子其人及其生活的年代，各执其说，看法不一。刘向《列子书录》中认为，列子是郑国人，生活时间与郑繆公(前627~前605)¹⁾同时；柳宗元《辨列子》一文中辩解说，列子当是鲁繆公(前407~前375)时人，刘向《列子书录》中误将鲁繆公记为郑繆公；叶大庆《考古质疑》中又解释说，刘向误以“繻”为“繆”，所以列子应与郑繻公(前422~前395)²⁾同时；高似孙在《子略》一书中对列子其人的真实存在甚至提出了质疑，怀疑该人与《庄子》寓言中的鸿蒙、列缺一样，都是虚构的子虚乌有之人，“周之末篇叙墨翟、禽滑厘、慎到、田骈、关尹之徒以及于周，而御寇独不在其列。岂御寇者，其亦所谓鸿蒙、列缺者欤？”³⁾

查考古籍文献，除《庄子》记载列御寇事迹之外，《尸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战国策》中也多处记载或提及列子，有的见之于人物对话，有的载之于故事叙述，也有的出现在后世学人对前代思想学术的

1) 刘向，《列子书录》：“列子者，郑人也，与郑繆公同时，盖有道者也。其学本于黄帝、老子，号曰道家。”

2) 叶大庆，《考古质疑》卷三：“因观《庄子·让王篇》云：‘子列子穷，貌有饥色。客有言于郑子阳曰：列御寇，有道之士也，居君之国而穷，君无乃不好士乎？子阳即令官遗之粟。列子再拜而辞。使者去。其妻曰：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，今有饥色。君过而遗先生食，先生不受，岂不命耶？列子笑曰：君非自我知我也。以人之言而遗我粟；至其罪我也，又且以人之言，此吾所以不受也。其卒，民果作难而杀子阳。’观此，则列子与郑子阳同时。及考《史记·郑世家》，子阳乃繻公时二十五年杀其相子阳，即周安王四年癸未岁也。然则列子与子阳乃繻公时人。刘向以为繆公，意者误以‘繻’为‘繆’欤？虽然，大庆未敢遽以向为误，姑隐之于心。续见苏子由《古史列子传》亦引辞粟之事，以为御寇与繻公同时。又观吕东莱《大事记》云：安王四年，郑杀其相驪子阳。遂及列御寇之事，然后因此以自信。盖列与庄相去不远。庄乃齐宣、梁惠同时，列先于庄，故庄子著书多取其言也。”

3) 高似孙，《子略》，《列子集释·附录三》征引(中华书局，1979.10)

归纳总结中。

《尔雅疏》引《尸子·广泽篇》云：“墨子贵兼，孔子贵公，皇子贵衷，田子贵均，列子贵虚，料子贵别，囿其学之相非也，数世矣而已，皆弇于私也。”⁴⁾

《韩非子·喻老》：“夫物有常容，因乘以导之，因随物之容。故静则建乎德，动则顺乎道。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，三年而成。丰杀茎柯，毫芒繁泽，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。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。列子闻之曰：‘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，则物之有叶者寡矣。’故不乘天地之资而载一人之身，不随道理之数而学一人之智，此皆一叶之行也。故冬耕之稼，后稷不能羨也；丰年大禾，臧获不能恶也。以一人力，则后稷不足；随自然，则臧获有余。故曰：‘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。’⁵⁾

《吕氏春秋·审己》：“子列子常射中矣，请之于关尹子。关尹子曰：‘知子之所以中乎？’答曰：‘弗知也。’关尹子曰：‘未可。’退而习之三年，又请。关尹子曰：‘子知子之所以中乎？’子列子曰：‘知之矣。’关尹子曰：‘可矣，守而勿失。’非独射也，国之存也，国之亡也，身之贤也，身之不肖也，亦皆有以。圣人不察存亡、贤不肖，而察其所以也。”⁶⁾

《吕氏春秋·观世》：“子列子穷，容貌有饥色。客有言之郑子阳者，曰：“列御寇，盖有道之士也，居君之国而穷，君无乃为不好士乎？”郑子阳令官遗之粟十秉。子列子出见使者，再拜而辞。使者去，子列子入，其妻望而拊心曰：“闻为有道者之妻子，皆得逸乐。今妻子有饥色矣，君过而遗先生食。先生又弗受也。岂非命也哉？”子列子笑而谓之曰：“君非自知我也，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也，至已而罪我也，又且以人言。此吾所以不受也。”其卒民果作难，杀子阳。受人之养而不死其难，则不义；死其难，则死无道也。死无道，逆也。子列子除不义、去逆也，岂不远哉？且方有饥寒之患矣，而犹不苟取，先见其化也。先见其化而已动，达乎性命之情也。”

4) 邢昺，《尔雅疏》，《四部丛刊》续编，1929年上海涵芬楼影印宋刊本。

5) 王先慎，钟哲点校，《韩非子集解》(中华书局，1998，7)

6) 张双棣，《吕氏春秋译注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0，9)

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：“老耽贵柔，孔子贵仁，墨翟贵廉，关尹贵清，子列子贵虚，陈骈贵齐，阳生贵己，孙臞贵势，王廖贵先，儿良贵后。”高诱注解列子说：“体道人也，壶子弟子。”

《战国策·韩策二》：“史疾为韩使楚。楚王问曰：‘客何方所循？’曰：‘治列子圉寇之言。’曰：‘何贵？’曰：‘贵正。’王曰：‘正亦可为国乎？’曰：‘可。’王曰：‘楚国多盗，正可以圉盗乎？’曰：‘可。’曰：‘以正圉盗，奈何？’顷间，有鹊止于屋上者。曰：‘请问楚人谓此鸟何？’王曰：‘谓之鹊。’曰：‘谓之乌，可乎？’曰：‘不可。’曰：‘今王之国有柱国、令尹、司马、典令，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洁胜任，今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，此乌不为乌，鹊不为鹊也。’”⁷⁾

由以上材料记载来看，先秦时期实有列子其人，还是可以肯定的。从这些简略零散的记载中，我们也能大概看出该人的一些身世特征：列姓，名御寇，思想主体崇尚虚无，与道家相类，生活年代当在庄周(前369~前295)之前。

III. 列子与《列子》其书的关系

《列子》一书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其归于列御寇名下。那么《列子》是否为列御寇所作呢？因材料所限，我们对这一问题不敢妄加断言。但从《列子》文本自身来判断，至少其中有些内容决非列御寇所作。

第一，一些内容发生在列御寇之后，明显属于后人所记。如《仲尼篇》第十三章：

中山公子牟者，魏国之贤公子也。好与贤人游，不恤国事；而悦赵人公孙龙。乐正子舆之徒笑之。公子牟曰：“子何笑牟之悦公孙龙也？”子舆曰：“公孙龙之为人也，行无师，学无友，佞给而不中，漫衍而无家，好怪

7) 《战国策》，四部备要本。

而妄言。欲惑人之心，屈人之口，与韩檀等肆之。”公子牟变容曰：“何子状公孙龙之过欤？请闻其实。”子舆曰：“吾笑龙之诒孔穿，言‘善射者能令后镞中前括，发发相及，矢矢相属；前矢造准而无绝落，后矢之括犹衔弦，视之若一焉。’孔穿骇之。龙曰：‘此未其妙者。逢蒙之弟子曰鸿超，怒其妻而怖之。引乌号之弓，綦卫之箭，射其目。矢来注眸子而眶不睫，矢隧地而尘不扬。’是岂智者之言与？”公子牟曰：“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晓。后镞中前括，钩后于前。矢注眸子而眶不睫，尽矢之势也。子何疑焉？”乐正子舆曰：“子，龙之徒，焉得不饰其阙？吾又言其尤者。龙诒魏王曰：‘有意不心。有指不至。有物不尽。有影不移。发引千钧。白马非马。孤犊未尝有母。’其负类反伦，不可胜言也。”公子牟曰：“子不谕至言而以为尤也，尤其在子矣。夫无意则心同。无指则皆至。尽物者常有。影不移者，说在改也。发引千钧，势至等也。白马非马，形名离也。孤犊未尝有母，非孤犊也。”乐正子舆曰：“子以公孙龙之鸣皆条也。设令发于余窍，子亦将承之。”公子牟默然良久，告退，曰：“请待余日，更谒子论。”

文中所提“中山公子牟”，即魏文侯(前446~前396)之子魏牟，公元前427年魏文侯伐得中山，并以其地封于公子牟，故又名中山公子牟。张湛注曰：“公子牟，文侯子，作书四篇，号曰道家。魏伐得中山，以邑子牟，因曰中山公子牟也。”“公孙龙”即战国时期名家代表人物，赵国人，曾为平原君赵胜的门客，据钱穆《先秦诸子系年》考证，其人大概生活于公元前325至公元前250年之间。⁸⁾“孔穿”乃孔子六世孙，字子高，曾问辩于公孙龙，钱穆考证该人生活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245年之间。从时间上判断，《仲尼篇》第十三章所记三人都是列御寇之后的历史人物，所以说该章内容不应出自列子之手。

此类内容还有其他几处：

《黄帝篇》第二十一章，文中所提“宋康王”即宋国末代国君偃(前328~前286)，谥号康王，“《战国策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皆以偃谥曰康王也。”⁹⁾可以断言，惠盎见宋康王一事发生在列御寇去世之后。所以叶大庆质疑说：“若

8) 钱穆，《先秦诸子系年·公孙龙说燕昭王偃兵》(中华书局，1985，10)

9) 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司马贞《索隐》(中华书局，1959，12)

列子为郑繻公时人，彼公孙龙乃平原之客。郝王十七年赵王封其弟胜为平原君，则公孙龙之事盖后于子阳之死一百年矣。而宋康王事又后于公孙龙十余年，列子焉得而预书之？”

《杨朱篇》第十三章，讲述杨朱与梁王讨论治理天下一事，梁(魏)之称王，始于魏惠王(前370~前318)元年，即公元前370年，此章即称魏国君为“王”，显然应是公元前370年之后的事情。

《说符篇》第十一章中论曰：“齐、楚、吴、越皆尝胜矣，然卒取亡焉，不达乎持胜也。”齐之亡于公元前221年，楚之亡于公元前223年，既然言及齐、楚之亡，所论时间应在公元前221年之后。

以时间为判断标准，以上几章所记内容都是列御寇之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，不可能与列御寇有关。

第二，许多章节中称呼列御寇为“子列子”或“列子”，这些内容也不应该出自列御寇本人。《列子·天瑞篇》第一章：“子列子居郑圃，四十年人无识者。”张湛注曰：“载‘子’于姓上者，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记故也。”古人称为“子某子”者，多出于弟子对老师的尊称，如子墨子、子司马子、子女子、子北宫子、子公羊子等。《列子》中称呼子列子的内容共有十五章，分见于《天瑞篇》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十、第十二章，《黄帝篇》第十四章，《周穆王篇》第二、第三章，《仲尼篇》第五、第六、第七章，《说符篇》第一、第四、第五章。除以上十五章内容中称列御寇为“子列子”外，《列子》中尚有五章内容称列御寇为“列子”，分见于《黄帝篇》第三、四、十三章，《说符篇》第二、三章。古人称呼某人时，凡在姓氏后加“子”者，多是对他人老师的一种尊称，如孔子、庄子、荀子、鲁连子等。《春秋公羊传·隐公十一年》：“子沈子曰：‘君弑，臣不讨贼，非臣也。不夏讎，非子也。葬，生者之事也。春秋，君弑贼不讨不书葬，以为不系乎臣子也。’”何休注曰：“沈子称子，冠氏上者，著其为师也，不但言子曰者，辟孔子也；其不冠子者，他师也。”¹⁰⁾《论语·学而》：“子曰：‘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悦

10) 何休注，徐彦疏，黄侃经文句读，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.12)

乎？”皇侃疏曰：“‘子’是有德之称。古者称师为子也。”¹¹⁾按古人称谓通例，以上二十章内容也不应归于列御寇所作。

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：《列子》一书是否完成于列子弟子或其后学之手？单从文献记载来看，我们无从查考这一问题。但细读《列子》文本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这一假设成立的可能性不大。因为书中思想杂乱、观点相悖之处随处可见。今举其要，以证是论。

第一，贵虚与贵实思想并存。

由《尸子·广泽篇》、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等先秦文献记载来看，崇尚虚无是列子哲学思想的主体，《列子》中的许多章节也确实体现了这一思想。如《天瑞篇》第十章：“或谓子列子曰：‘子奚贵虚？’列子曰：‘虚者无贵也。’子列子曰：‘非其名也，莫如静，莫如虚。静也虚也，得其居矣；取也与也，失其所矣。事之破毁而后有舞仁义者，弗能复也。’”要求人们摒弃世俗的得失，排除人为的名利，始终保持一种虚默清静的心性。再如《天瑞篇》第十三章、《黄帝篇》第二章、《仲尼篇》第二章，在内容上都宣扬一种万物归虚、任其自然的虚无思想。

《列子》中也有一些内容体现出“贵实”的思想，如《杨朱篇》第三章：“然而万物齐生齐死，齐贤齐愚，齐贵齐贱。十年亦死，百年亦死。仁圣亦死，凶愚亦死。生则尧舜，死则腐骨；生则桀纣，死则腐骨。腐骨一矣，孰知其异？且趣当生，奚遑死后？”人的最终结局都是一样的。即使象尧舜一样贤明一生，死后也是腐骨一堆，哪怕象桀纣一样残暴一世，死后同样也是腐骨一堆。既然生命的终点都一样，我们有必要恪守律己，追求虚妄的美名吗？倒不如以实际为务，享受当生的快乐。《杨朱篇》第二章、第四章、《说符篇》第二十章、第二十六章、第三十二章等，都体现了一种避虚求实的人生态度，与前文主张的“贵虚”思想截然相反。

第二，在处世态度上出现正反两种不同的观点。

《杨朱篇》第三、第五、第七、第八、第十一、第十三章中，宣扬了一

11) 何晏集解，皇侃义疏，《论语集解义疏》，《丛书集成》初编本(商务印书馆，1937.6)

种任性而行、放逸肆情的自由主义人生态度，如第五章云：“可在乐生，可在逸身。故善乐生者不窳，善逸身者不殖。”人生正确的生活方式在于，使生命快活，使身心逸乐。第七章云：“肆之而已，勿壅勿阏。”活着就要无所顾忌，尽情享受人生的乐趣，不要担心死后的得失与恶名。第八章云：“为欲尽一生之欢，穷当年之乐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，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；不遑忧名声之丑，性命之危也。”人活一世就要享受活着的快乐，尽量满足食欲、情欲的要求，不要过多忧虑名声的丑恶、性命的安危。

《列子》中也有一些内容劝戒人们要谨慎其行，修身立德。《说符篇》第十五章：“楚庄王问詹何曰：‘治国柰何！’詹何对曰：‘臣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也。’楚庄王曰：‘寡人得奉宗庙社稷，愿学所以守之。’詹何对曰：‘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，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。故本在身，不敢对以末。’楚王曰：‘善。’”通过詹何之言，告诫庄王，只有修其身，养其德，才能治其邦国，安其社稷。《说符篇》第二十二章：“利出者实及，怨往者害来。发于此而应于外者唯请，是故贤者慎所出。”指出：利人者才能利己，害人者等于害己，所以有德之人都会谨其言，慎其行。

第三，对于“智”的态度，也出现了两种矛盾的主张。

《老子》认为“智慧出，有大伪”，所以主张“绝圣弃智”。可以说，反对用“智”，是先秦道家思想的主要哲学态度之一。《列子》中也有相同的看法，如《仲尼篇》第十四章：“尧治天下五十年，不知天下治欤，不治欤？不知亿兆之愿戴己欤？不愿戴己欤？顾问左右，左右不知。问外朝，外朝不知。问在野，在野不知。尧乃微服游于康衢，闻儿童谣曰：‘立我蒸民，莫匪尔极。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’尧喜问曰：‘谁教尔为此言？’童儿曰：“我闻之大夫。’问大夫。大夫曰：‘古诗也。’尧还宫，召舜，因禅以天下。舜不辞而受之。”“识”通“智”，意为智慧、智谋。借“尧治天下”的故事，提出顺物之情、摒弃圣智技巧的主张，反对那些任逞意志、违背自然的做法。

同时，《列子》中也有重视“智”、利用“智”的内容。如《杨朱篇》第十五章云：“人肖天地之类，怀五常之性，有生之最灵者也。人者，爪牙不足以供守卫，肌肤不足以自捍御，趋走不足以从利逃害，无毛羽以御寒暑，

必将资物以为养，任智而不恃力。”与飞禽走兽相比，人类没有尖利的爪牙用来防卫，没有坚硬的皮肤用来抵御外敌的攻击；不可能象鸟兽一样快跑如飞，以逃避灾祸，身上又没有厚厚的毛羽，来抵挡风寒。所以人要想存活，就必须依靠智慧。接着又进一步强调：“智之所贵，存我为贵；力之所贱，侵物为贱。”正是从保存自身的角度出发，得出智贵力贱的价值判断，智慧之所以高贵，就在于它能够保全自身。《说符篇》第六章：“且天下理无常是，事无常非。先日所用，今或弃之；今之所弃，后或用之。此用与不用，无定是非也。投隙抵时，应事无方，属乎智。智苟不足，使若博如孔丘，术如吕尚，焉往而不穷哉？”极力突出智谋在人们处世生存过程中的作用。如果智谋不足，即使博学如孔子，御兵如姜太公，也照样处处碰壁。同样的例证还有《黄帝篇》第十九章：“宋有狙公者，爱狙；养之成群，能解狙之意；狙亦得公之心。损其家口，充狙之欲。俄而匮焉，将限其食。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，先诳之曰：‘与若茅，朝三而暮四，足乎？’众狙皆起而怒。俄而曰：‘与若茅，朝四而暮三，足乎？’众狙皆伏而喜。物之以能鄙相笼，皆犹此也。圣人以智笼群愚，亦犹狙公之以智笼众狙也。名实不亏，使其喜怒哉！”狙公所以能够达到目的，正是智谋使之然也。

第四，在对待“天人感应”的态度上，前后也有差异。

一方面，认为人体的盈虚变化与天地相互通接，与外物相互感应。《周穆王篇》第三章曰：“觉有八征，梦有六候。……奚谓六候？一曰正梦，二曰噩梦，三曰思梦，四曰寤梦，五曰喜梦，六曰惧梦。此六者，神所交也。不识感变之所起者，事至则惑其所由然，识感变之所起者，事至则知其所由然。知其所由然，则无所怛。一体之盈虚消息，皆通于天地，应于物类。”人体的各种特征变化是与外物相感应的。如果认识不到这种感应产生的根本，那么即使事情发生了，也会困惑不解。如果对天、人之间的变化感应有了根本的认识，就不会对发生的事情感到迷惑恐惧了。

另一方面，《列子》中又对“天人感应”学说提出了质疑，对上文“天人感应”思想予以否定和批判。《说符篇》第二十八章：“齐田氏祖于庭，食客千人。中坐有献鱼雁者，田氏视之，乃叹曰：‘天之于民厚矣！殖五谷，生

鱼鸟以为之用。’众客和之如响。鲍氏之子年十二，预于次，进曰：‘不如君言。天地万物与我并生，类也。类无贵贱，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，迭相食；非相为而生之。人取可食者而食之，岂天本为人生之？且蚊蚋嚼肤，虎狼食肉，非天本为蚊蚋生人、虎狼生肉者哉？’面对宾客所献鸡鸭鱼雁，阳氏发表议论说，上天对我们太关照了，它繁殖五谷、生育飞禽走兽来供养我们吃喝享受。鲍家十二岁之子反驳说，天地万物与人之间各成其类，弱肉强食、相互制约本来就是自然之道，不存在谁为谁生的说法，也不存在上天供养人类的道理。实际上是借鲍家之子，反驳了天人相通的思想，批判了上天安排人事的神学观念。

以上对比分析说明，《列子》一书不只是出于列子及其后学一派之手，书中明显掺杂了其它学派的内容，比如庄子学派。这从《黄帝篇》第五章中可以看出。

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，引之盈贯，措杯水其肘上，发之，镞矢复沓，方矢复寓。当是时也，犹象人也。伯昏无人曰：“是射之射，非不射之射也。当与汝登高山，履危石，临百仞之渊，若能射乎？”于是无人遂登高山，履危石，临百仞之渊，背逡巡，足二分垂在外，揖御寇而进之。御寇伏地，汗流至踵。伯昏无人曰：“夫至人者，上窥青天，下潜黄泉，挥斥八极，神气不变。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，尔于中也殆矣夫！”

此段内容在思想上主要说明，至人的最高境界在于忘记万物，心与自然混为一体。从哲学思想的主体来看，此章内容与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倾向较为一致，应属于道家学术思想范畴。从具体描写来看，应是庄子学派所为。文中的主要人物伯昏无人，乃庄子学派推崇的得道之人。文字描写上极力宣扬伯昏无人的道行之高，贬低甚至丑化列御寇的道行之低，“御寇伏地，汗流至踵。”查《庄子》一书，《田子方》中果然记载有同样内容的事。由此可以证明，我们上述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IV. 如何解读《列子》中的掺杂内容

既然《列子》中有他书或他人掺杂的内容,那么这些内容是如何杂入《列子》中的呢?是无意混入,还是故意抄袭?如果是混入,混入的途径是什么?如果是抄袭,抄袭的动机又是什么?下面,我们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。

一、掺杂内容应由窜简所致

《尸子·广泽篇》云:“墨子贵兼,孔子贵公,皇子贵衷,田子贵均,列子贵虚,料子贵别,圉其学之相非也,数世矣而已,皆弇于私也。”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也有相同的看法:“老聃贵柔,孔子贵仁,墨翟贵廉,关尹贵清,子列子贵虚,陈骈贵齐,阳生贵己,孙臧贵势,王廖贵先,儿良贵后。”从这些文献记载判断,先秦时期列御寇已经构筑了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,已经能够与老聃、孔子、墨翟、关尹、孙臧等诸子思想相提并论。《战国策·韩策二》记载说,史疾出使楚国时,楚王问他“何方所循?”史疾回答说:“治列子圉寇之言。”治者,研究也。言者,言论、学说、著作也。由史疾的回答来判断,战国末期¹²⁾原本《列子》(即最初由列御寇或其后学整理的内容)的内容即已载于简帛,开始流传于世。

我们推测,《列子》中的部分内容是在简文窜乱的情况下杂入的。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,原本《列子》与其他文献一起遭损,书与书之间,章节与章节之间出现了窜简现象,后来整理者整理修补时又误将他书内容掺入《列子》,从而造成思想内容上的杂乱无章。之所以有以上推断,主要缘于《列子》文本中至今仍存有残损补缀的痕迹。

第一,《黄帝篇》第三章与《仲尼篇》第六章、《黄帝篇》第九章与《说符篇》第九章之间出现有自身重文现象,用残损补缀来解释这种现象,是最为合理的。其中以《黄帝篇》第三章与《仲尼篇》第六章之间进行

12) 凌迪知,《万姓统谱》卷七十四考证说,史疾出使楚国当在楚考列王(前262~前237)时。

的内容对比来看，残损补缀的迹象尤为明显。（详见第四章《〈列子〉研究中的其他几个问题》）

第二，《列子》中许多章节从头至尾都是某一人的语录式语言，而此人既非列御寇，又非列子后学。我们认为，这些内容很可能是简文损坏后留存的残文部分。如《天瑞篇》第十一章：

粥熊曰：“运转亡已，天地密移，畴觉之哉？故物损于彼者盈于此。成于此者亏于彼。损盈成亏，随世随死。往来相接，间不可省，畴觉之哉？凡一气不顿进，一形不顿亏；亦不觉其成，亦不觉其亏。亦如人自世至老，貌色智态，亡日不异；皮肤爪发，随世随落，非婴孩时有停而不易也。间不可觉，俟至后知。”

粥(鬻)熊，祝融十二世孙，楚之祖先。《列子》中何以出现鬻熊语录式章节呢？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，《列子》残损，整理者将书中残存的鬻熊言论保留下来，单独成章。或《列子》与他书一起残损错简，整理者误将他书载录的鬻熊独白性章节错置于《列子·天瑞篇》中。

上述例子还有很多，如《天瑞篇》的第五、第六章，都是《黄帝书》之言。《仲尼篇》的第十五章，都是关尹喜的语言。《杨朱篇》的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十二、第十四、第十五、第十六、第十七章，《说符篇》的第二十二章、第二十五章，都是杨朱的论语。

第三，有些章节在内容上出现语义短缺现象。如《天瑞篇》第十章：

或谓子列子曰：“子奚贵虚？”列子曰：“虚者无贵也。”子列子曰：“非其名也，莫如静，莫如虚。静也虚也，得其居矣；取也与也，失其所矣。事之破毁而后有舞仁义者，弗能复也。”

此章以“或谓子列子曰：‘子奚贵虚？’”开篇，就给人一种文意断裂的突兀之感。接下来，是列子的答语，“虚者无贵也”，与前面问话还是紧密承接的。正常情况下，下一句又该是问话，然后再是答语。但第十章中接下来

没有问话,直接就是答语。而且从文意上看,第二句答语在中心意思上主要是批判仁义的说教,与前面问语“子奚贵虚?”没有文意上的前后承接关系。应该说,此处存在语句残漏的现象。

同样的例子还有《杨朱篇》第五章:“杨朱曰:‘原宪窆于鲁,子贡殖于卫。原宪之窆损生,子贡之殖累身。’然则窆亦不可,殖亦不可;其可焉在?’曰:‘可在乐生,可在逸身。故善乐生者不窆,善逸身者不殖。’”此章属于对话性语言,但除了开头交代“杨朱”之外,每次说话人的身份都已缺漏。

第四,《列子》中还有前后句义错位的现象。如《天瑞篇》第五章:

《黄帝书》曰:“形动不生形而生影,声动不生声而生响,无动不生无而生有。形,必终者也;天地终乎?与我偕终。终进乎?不知也。道终乎本无始,进乎本不久。有生则复于不生,有形则复于无形。不生者,非本不生者也;无形者,非本无形者也。生者,理之必终者也。终者不得不终,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。而欲恒其生,画其终,惑于数也。精神者,天之分;骨骼者,地之分。属天清而散,属地浊而聚。精神离形,各归其真;故谓之鬼。鬼,归也,归其真宅。黄帝曰:‘精神入其门,骨骼反其根,我尚何存?’人自生至终,大化有四:婴孩也,少壮也,老耄也,死亡也。其在婴孩,气专志一,和之至也;物不伤焉,德莫加焉。其在少壮,则血气飘逸,欲虑充起;物所攻焉,德故衰焉。其在老耄,则欲虑柔焉;体将休焉,物莫先焉。虽未及婴孩之全,方于少壮,间矣。其在死亡也,则之于息焉,反其极矣。”

全章都是《黄帝书》的引言,但在内容上并不一致,前后可分为两层意思,开头至“我尚何存”属于第一层,主要揭示道与具体事物、与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;自“人自生至终”句到结尾属于第二层,主要论述人生的四个发展阶段。在思想内容上,两层之间联系非常松散,严格说来,前后两部分文字之间没有承接关系,不应归于同一章节。所以,我们怀疑二者之间本来不相联系,《列子》遭损后,简文错乱,整理者误将其连缀到一起。杨伯峻先生在《列子集释》中也认为二者之间联系不大,故将其分置两章(即《列子集释·天瑞篇》第五、第六章),注曰“原本不提行,今依文义分段。”

再如《汤问篇》第四章：

大禹曰：“六合之间，四海之内，照之以日月，经之以星辰，纪之以四时，要之以太岁。神灵所生，其物异形；或夭或寿，唯圣人能通其道。”夏革曰：“然则亦有不待神灵而生，不待阴阳而形，不待日月而明，不待杀戮而夭，不待将迎而寿，不待五谷而食，不待缁纁而衣，不待舟车而行，其道自然，非圣人之所通也。”

此章前半部分是大禹的话，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中也有完全一样的文字内容。后半部分是夏革的话，不见于他书记载。两部分既有相互关联的内容，又有错位之处。夏革话中所提情形有八：“不待神灵而生者”、“不待阴阳而形者”、“不待日月而明者”、“不待杀戮而夭者”、“不待将迎而寿者”、“不待五谷而食者”、“不待缁纁而衣者”、“不待舟车而行者”，而上文内容中与之对应的只有其一和其三，不符合正常的对话惯例。更为可疑的是，两位对话者的生活年代相差五百多年，大禹乃夏之祖先，夏革乃商汤之名臣。将毫不相关的两个人的语录式语言合为一章，一定是有简文窜乱情况的发生。或者是，整理者根据他书内容对原有文字加以补缀。此章内容，毕沅即认为是后人根据《山海经》补缀而成，“《列子》正用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。”¹³⁾

同样的例子还有《天瑞篇》第九章：

子贡倦于学，告仲尼曰：“愿有所息。”仲尼曰：“生无所息。”子贡曰：“然则赐息无所乎？”仲尼曰：“有焉耳。望其圻，睪如也，宰如也，坟如也，鬲如也，则知所息矣。”子贡曰：“大哉死乎！君子息焉，小人伏焉。”仲尼曰：“赐！汝知之矣。人胥知生之乐，未知生之苦；知老之惫，未知老之佚；知死之恶，未知死之息也。晏子曰：‘善哉，古之有死也！仁者息焉，不仁者伏焉。’死也者，德之微也。古者谓死人为归人。夫言死人为归人，则生人为行人矣。行而不知归，失家者也。一人失家，一世非之；天下失家，莫

13) 杨伯峻，《列子集释》注引(中华书局，1979.10)

知非焉。有人去乡土、离六亲、废家业、游于四方而不归者，何人哉？世必谓之为狂荡之人矣。又有人钟贤世，矜巧能、修名誉、夸张于世而不知己者，亦何人哉？世必以为智谋之士。此二者，胥失者也。而世与一不与一，唯圣人知所与，知所去。”

此章可分为两部分内容，开头至“德之微也”，主要由子贡倦学引出孔子对“息”的谈论；自“古者谓死人为归人”到结尾，主要讲述人们对浪游之人、热衷入世之人的两种不同态度。前后两层在内容表达上没有必然的联系，前一层纠正人们对死亡的错误认识；后一层纠正人们对于浪游之人、热衷入世之人的错误态度。文意上不相连，思想上也不相合。“子贡倦学”的故事也见载于《荀子·大略》和《孔子家语·困誓》，但两文都只有第一部分内容，而没有第二部分，这也印证了我们的上述猜测。所以说，这两段文字应该来自不同的出处。

以上现象说明，《列子》的内容在流传过程中确曾遭损，并出现了脱简、错简现象，从而导致内容错乱、他书内容混入的情况发生。

二、《列子》中又有他人增窜的内容

《列子》一书在流传过程中，除了因为窜简而掺杂了一些他书内容之外，可能还被人人为地增窜了许多内容。

据我们统计，先秦文献中记载列御寇的内容共有十三处，分见于《庄子》、《尸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与《战国策》中，其中有两处是言语中提及，关涉内容较少，如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云：“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。”另有两处是在学术思想总结时提到，如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云：“关尹贵清，子列子贵虚。”其余九处都是以故事的形式对列子予以陈述，交代比较详细。而这九处内容都重见于《列子》中，文辞内容基本相同。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，或曰：是诸书抄袭《列子》所致。那么，我们要问，《列子》中九处内容不重复地分置于四本书中，难道是偶合？还是四本书的作者提前有约，各抄几章？显然这一解释是不符合常理的。较为合理的解释是：《列子》残损后，整理者整理《列子》时，将先秦文献中记载列

子的故事传说一概纳入到《列子》中，以补残漏。

再如《汤问篇》第七章所记“两小儿辩日”的故事。东汉桓谭的《新论》中也记有这一故事：

余小时闻闾巷言。孔子东游，见两小儿辩斗。问其故。一儿曰：“我以日始出时近，日中时远。”一儿以日初出远，日中时近。长水校尉平陵关子阳，以为日之去人，上方远而四旁近。何以知之？星宿昏时出东方，其间甚疏，相离丈余。及夜半，在上方视之甚数，相离为一二尺，以准度望之，逾益明白。故知天上之远于傍也。日为天阳，火为地阳。地气上升，天气下降。今置火于地，从旁与上诊其热，远近殊不同，乃差半焉。日中正在上覆盖人，人当天阳之冲，故热于始出时。又新从太阴中来，故复凉于西。在桑榆间，大小虽同，气犹不如清朝也。桓君山曰：“子阳之言，岂其然乎？”¹⁴⁾

至于这一故事的来源出处，桓谭并没有参考《列子·汤问篇》所记，而是取自街谈巷语，“余小时闻闾巷言”。由此我们推测，“两小儿辩日”的内容本是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，两汉时代在百姓之间长期流传。此故事不仅被桓谭采入《新论》，也被《列子》的整理补缀者收录于《列子》中。

或云：《列子》整理者增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对于这一问题，我们只能从古籍的散聚中去寻求答案。

汉代之前，古籍曾有两次浩劫，一次是秦始皇焚书。“非秦记皆烧之。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敢有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者，悉诣守、尉杂烧之”¹⁵⁾；一次是书亡项羽。刘大魁《焚书辨》中说：“迨项羽入关，杀秦降王子婴，收其宝货妇女，烧秦宫室，火三月不灭。而后唐虞三代之法制，古先圣人之微言，乃始荡为灰烬。”¹⁶⁾西汉建立之后，历代帝王都不遗余力地采掇亡书，“汉兴，改秦之败，大收篇籍，广开献书之路。迄孝武世，书缺简脱，礼坏乐崩，圣上喟然而称曰：‘朕甚闵焉！’于是建藏书之策，置写书之

14) 严可君，《全后汉文》辑录《新论》(商务印书馆，1999.10)

15) 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(中华书局，1959)

16) 陈登原，《古今典籍聚散考》(商务印书馆，1936.1)

官，下及诸子传说，皆充秘府。”¹⁷⁾并对献书之人给予奖赏，“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，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。从民得善书，必为好写与之，留其真，加金帛赐以招之。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，或有先祖旧书，多奉以奏献王者，故得书多，与汉朝等。”¹⁸⁾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，“前面讲历代帝王广开献书之路，有许多人存心不良，造假书以邀赏。又因为赏之重轻，以卷数之多寡为准，所以有人割裂他书篇幅充数，以求赏赐增加。”¹⁹⁾可能出于贪图更多奖赏的目的，整理者又抄袭添补了大量他书内容，因为从汉代图书收集情况来看，冒充造假的情况非常普遍，“是时，淮南王安亦好书，所招致率多浮辩。”²⁰⁾

V. 《列子》整理补缀的时间推测

既然《列子》内容经历了再次整理，又被添补一些他书内容，那么《列子》的整理补缀发生在何时呢？根据书中内容判断，应在秦代之后。原因如下：

第一，《周穆王篇》第七章云：“鲁有儒生自媒能治之，华子之妻子以居产之半请其方。”马叙伦论证说：“儒生之名，汉世所通行，先秦未之闻也。”此说可立。马达先生举数例以辩秦代即有“儒生”之说，但所举例证皆出《史记》。比如《史记·封禅书》云：“即帝位三年，东巡郡县，祠临峯山，於是徵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，至乎泰山下。诸儒生或议曰：‘古者封禅为蒲车，恶伤山之土石草木；埽地而祭，席用菹秸，言其易遵也。’始皇闻此议各乖异，难施用，由此绌儒生。”所记史实虽发生于秦始皇时期，但叙述者司马迁却是西汉人。查先秦古籍，有称呼儒学之士为“儒”的，但没有

17) 《汉书·艺文志》(中华书局, 1962)

18) 《汉书·河间献王刘德传》(中华书局, 1962)

19) 梁启超, 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(中华书局, 1955.9)

20) 《汉书·河间献王刘德传》(中华书局, 1962)

称呼“儒生”的。如《吕氏春秋·必已》云：“牛缺，居上地，大儒也。”

第二，《汤问篇》第一章云：“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，有大壑焉，实惟无底之谷，其下无底，名曰归墟。八紘九野之水，天汉之流，莫不注之，而无增无减焉。其中有五山焉：一曰岱舆，二曰员峤，三曰方壶，四曰瀛洲，五曰蓬莱。”方壶，又名方丈，与岱舆、员峤、瀛洲、蓬莱一起，都是古代传说中的海上神山。其中方壶、瀛洲、蓬莱三山，最早见于秦代术士给嬴政所上奏书中，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“既已，齐人徐市等上书，言海中有三神山，名曰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仙人居之。”可见，三山之名乃徐市等人虚造，意在骗取始皇好感。以此推断，《列子》修补时间当不早于秦代。《汤问篇》言方壶、瀛洲、蓬莱，殷敬顺《释文》引《史记》云：“此三神山在渤海中。”引《史记》所云为注，而没有引用汉代之前的其他古籍，说明先秦古籍中没有“蓬莱、方丈、瀛洲”三山的记载，否则，殷敬顺也会予以引录。

第三，《汤问篇》第一章又云：“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；断鳌之足以立四极。”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故事首见于《淮南子》²¹⁾，此故事在汉代较为流行。所以刘汝霖论证说：“我看此书(《列子》)虽不是魏晋人伪造，却也不是先秦的作品。……《汤问篇》引岱舆、员乔、方壶、瀛洲、蓬莱，后三山始见于《史记》，就是神仙家骗秦始皇所称的三神山。又称女娲氏炼五色石补天的故事，俱盛行于汉代，可以断定此书是汉时的作品。”²²⁾

第四，《仲尼篇》第二章：“陈大夫聘鲁，私见叔孙氏。叔孙氏曰：‘吾国有圣人。’曰：‘非孔丘邪？’曰：‘是也。’何以知其圣乎？叔孙氏曰：‘吾常闻之颜回曰：孔丘能废心而用形。’陈大夫曰：‘吾国亦有圣人，子弗知乎？’曰：‘圣人孰谓？’曰：‘老聃之弟子有亢仓子者，得聃之道，能以耳视而目听。’”据何治运考证说：“《庄子》颇诋孔子，此自道家门户不同儒家之故。而此书(指《列子》)以黄帝孔子并称圣人，则又出于二汉圣学昌明之后，必

21) 《淮南子·览冥》：“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，断鳌足以立四极，杀黑龙以济冀州，积芦灰以止淫水。”

22) 刘汝霖，《周秦诸子考》(文化学社，1929)

非战国之书也。”

第五，书中内容有避刘邦讳的迹象。比如《说符篇》第四章曰：

宋人有为其君以玉为楮叶者，三年而成。锋杀茎柯，毫芒繁泽，乱之楮叶中而不可别也。此人遂以巧食宋国。子列子闻之，曰：“使天地之生物，三年而成一叶，则物之有叶者寡矣。故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。”

与之重文的《韩非子·喻老》云：

夫物有常容，因乘以导之，因随物之容。故静则建乎德，动则顺乎道。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，三年而成。丰杀茎柯，毫芒繁泽，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。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。列子闻之曰：“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，则物之有叶者寡矣。”故不乘天地之资而载一人之身，不随道理之数而学一人之智，此皆一叶之行也。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；丰年大禾，臧获不能恶也。以一人力，则后稷不足；随自然，则臧获有余。故曰：“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。”

《韩非子·喻老》中的“宋邦”，在《说符篇》中已经改为“宋国”。由前文分析得知，在二者的关系上应是《说符篇》抄袭了《韩非子·喻老》，改“邦”为“国”，应是避刘邦之讳。

以上几条理由能够说明，《列子》中许多内容应该出于秦代之后。

总之，《列子》中既有列御寇或者后学所作内容，也有他书或他人掺杂的内容。关于这一点，前人的研究中已经有所察觉，只是未作详论，如刘向《列子书录》中指出：“《穆王》、《汤问》二篇，迂诞恢诡，非君子之言也。至于《力命篇》，一推分命；杨子之篇，唯贵放逸，二义乖背，不似一家之书。”宋濂《诸子辨》中也怀疑《杨朱》《力命》二篇非《列子》原文，“至于《杨朱》、《力命》则‘为我’之意多；疑即古杨朱书，其未亡者剽附于此。”另外，该书的成分也较为复杂，其中可能含有列御寇及其后学所作内容，同时也杂有其他文献的一些文字，至于掺杂的原因，由书中内容的残缺迹象来判断，应该是出于书简的残损窜乱。该书在后期流传中又有增补的文字，正如汪继培所说，“会萃补缀之迹，诸书见在，可覆按也。”²³⁾

至于增补的动机，可能与增补者贪图赏赐有关。

<參考文獻>

- 姚际恒等撰，《古书辨伪四种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35年。
严可君撰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中华书局，1958年。
俞樾撰，《诸子平议》，成都书局刊印。
俞樾等著，《古书疑义举例五种》，中华书局，1956年。
黄奭撰，《黄氏逸书考》，1934年江都朱长圻据甘泉黄氏原版补刊印本。
江侠庵编，《先秦经籍考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31年。
刘汝霖著，《周秦诸子考》，文化学社，1929年。
钱穆著，《先秦诸子系年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。
陈寅恪著，《寒柳堂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。
陈登原著，《古今典籍聚散考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36年。
张心澄著，《伪书通考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39年。
张舜徽著，《周秦道论发微》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。
余嘉锡撰，《余嘉锡说文献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。
黄云眉著，《古今伪书考补证》，山东人民出版社，1959年。
严灵峰著，《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》，中华书局，1991年。
李学勤著，《走出疑古时代》，辽宁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。
尚永亮师著，《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》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2000年。
黄卓明著，《诸子学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。
马达著，《〈列子〉真伪考辨》，北京出版社，2000年。

23) 马叙论，《列子伪书考》引，《天马山房丛书》，民国刊本。

<國文提要>

《列子》는 중국 고대에서 전해온 중요한 철학명저이며, 동시에 논쟁할 부분이 많은 학술저서이기도 하다. 《列子》의 眞偽 문제, 저술시기, 저술과정, 수록내용 등 많은 문제에 대해서 역대 학자들이 논의해 왔지만 아직 까지도 정론은 없다. 본 논문에서는 그 중 列子の 문헌기재 상황, 列子와 《列子》의 관계, 《列子》의 편집시기 등 일부 문제들에 대해서 체계적인 고증과 논증을 진행하려고 노력하였고, 저자의 생각과 견해를 밝혀 놓았다. 저자 본인의 주요 견해로 언급할 수 있는 것은 크게 세가지가 있다. 첫째, 列子는 역사상의 실존인물이다. 둘째, 《列子》 중의 일부 내용은 列子가 저술한 내용이 아니며, 후대 사람들이 덧붙인 것이다. 셋째, 《列子》의 편집년도는 秦대 이후이다. 저자의 학식이 한계가 있어서 좀 더 심도 있고 체계적인 논술이 이루어지지 못한 점을 널리 이해하길 바라며, 많은 지도와 편달을 기대한다.

주제어 : 《列子》, 列子, 《列子》成书, 《列子》的内容, 列子与《列子》

